



MMS

Modern Media Studies

MMS, Vol. 2, No. 1, 2026, pp.109-117.

Print ISSN: 3078-3151; Online ISSN: 3104-5049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m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60110pkahd>



跌落神坛的心理治疗：

伍迪·艾伦电影对心理医生形象的幽默祛魅

吴梦莎（Wu Mengsha），赵一墨（Zhao Yimo）

摘要：伍迪·艾伦的电影以其独特的幽默风格，成功地将心理医生这一形象从神坛上拉下。他镜头下的心理医生形象往往自私冷漠、满口深奥术语，却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显得无能而平庸。这一刻画极大地消解了心理医生的权威地位，祛除了他们身上的专业光环，更揭示了心理治疗看似科学实为集体迷信的本质。而这一切都得益于伍迪·艾伦对幽默策略的熟稔运用。其幽默策略主要表现为并置不协调、笑话、反讽和重复等方面。

关键词：伍迪·艾伦电影；幽默策略；心理医生

作者简介：吴梦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美国文学。电邮：18819422184@sina.cn。赵一墨（通讯作者），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电影文学。电邮：zhaoyimo2012@163.com。

Title: Psychotherapy Knocked off the Altar: A Humorous Demystification of Psychoanalysts in Woody Allen's Films

Abstract: Woody Allen's films, with their distinctive humorous style, have successfully demystified the image of the psychoanalyst. Under his lens, the psychoanalyst figure is often selfish and apathetic, full of obscure terminology, yet appears inept and banal when solving practical issues. This portrayal significantly dissolves the authoritative status of psychoanalysts,

dispels their professional mystique, and moreover, reveals that the seemingly scientific nature of psychotherapy is essentially a collective superstition. This is all thanks to Allen's skillful application of humor strategies, mainly manifested in incongruous juxtaposition, jokes, irony, and repetition.

Keywords: Woody Allen's Films; Humor Strategies; Psychoanalyst

Author Biographies: **Wu Mengsha**, a Ph.D. candidate in the Faculty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hina. Research interests: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18819422184@sina.cn. **Zhao Yimo** (Corresponding Author),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Guangzhou College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Film Literature. E-mail: zhaoyimo2012@163.com.

引言

美国银幕上的心理医生形象自 20 世纪初至今经历了显著的阶段性演变。在默片时代至二战前的好莱坞电影中，这一角色多呈现为一种程式化的刻板印象，即常被塑造为操着浓重欧洲口音、蓄着弗洛伊德式胡须、佩戴夹鼻眼镜的专家形象，这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心理分析这一欧陆舶来品既好奇又戒备的矛盾心理。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得益于心理治疗（psychiatry）在二战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治疗中取得显著成效，银幕上的心理医生形象迎来了转变，常被塑造成“理性、适应性和幸福的权威代言人”（Gabbard, 1987, p. 84），其专业权威性与战后美国社会重建秩序的需求高度契合。然而，尽管其银幕形象在这一黄金时代（约为 1957 - 1963）被短暂地神圣化和理想化，其权威地位却未能持久。60 年代后期，在反文化运动、越战和水门事件的三重冲击下，“理想美国”神话的破灭引发深刻的幻灭感，曾经科学权威的心理治疗无力再治愈社会创伤，心理医生的银幕形象自然随之滑向了负面。

在黄金时代而后的转向中，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成为颠覆心理医生正面形象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电影对心理治疗主题情有独钟，常常将心理医生刻画为无能、平庸甚至冷漠的负面形象。然而，学界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电影中接受心理治疗的患者形象，而忽略了治疗另一极的心理医生形象。比如格劳科·M·根加（Glaucio M. Genga）和玛丽亚·加布里埃拉·佩迪科尼（Maria Gabriella Pediconi）（2011, p. 5-6）归纳了艾伦电影中患者所患神经官能症的三重典型表征，即自恋、精神紊乱和性变态；孙慰川和覃嫦（2008, p.116）则将电影中患者普遍的焦虑归咎为美国后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心理投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虽论及电影中的心理医生形象，却未能深入分析导演对这一形象的塑造策略和用意。如米格尔·安赫尔·韦尔塔·弗洛里亚诺（Miguel Ángel Huerta Floriano, 2008）仅对心理医生形象作了粗略分类。而陈奇佳（2012, p. 133）更是断言，艾伦对心理医生形象的刻画仅停留在场景性的揶揄层面，缺乏对心理治疗的深层批判。

本文认为，艾伦电影中对心理医生形象的负面刻画，远非肤浅的揶揄，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幽默祛魅。诚如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 1991, p. 98）所言，幽默具有强大的颠覆功能，它“代表着等级制度的瓦解，亲密取代了客套，非正式价值观压倒了正统标准”。本文旨在分析伍迪·艾伦如何运用幽默策略对心理医生这一曾经被神化和理想化的人物形象进行了解构，从而有力地表达了对心理治疗的嘲讽和批判。

一、并置不协调与权威形象的降格

定义幽默绝非易事。E.B.怀特（E.B.White）曾妙喻：“剖析幽默，犹如用几何学解析蛛网般徒劳”（Marquis, 2011, p.14）。学界对幽默本质的探讨莫衷一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不协调理论（incongru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引人发笑的客体就是不协调性：“在特定情境中，当感知或观念客体与我们的预期相冲突，笑意便油然而生”（Morreall, 1987, p. 6）。“所有幽默都源于恰到好处的好处不协调性”（Oring, 1992, p. 5）。

伍迪·艾伦极其擅长在电影中通过并置不协调的元素来引发喜剧效果，以此勾勒出无能的心理医生形象。在《汉娜姐妹》（1986）中，饱受死亡焦虑折磨的米基抱怨道：“我做了好几年心理治疗，毫无进展。我那可怜的心理医生沮丧极了，最后在诊所里搞了个沙拉吧”。在这句独白所建构的画面空间中，位于诊所中的沙拉吧与周围陈设显然格格不入：本应疗愈心灵的神圣空间，被降格为提供沙拉的餐饮场所。沙拉所象征的健康饮食与患者的心理问题更是形成尖锐的对比，侧写出一个早已黔驴技穷的心理医生形象：本该作为理性化身的心理医生，竟企图让患者（甚至可能是他自己）通过摄入沙拉来保持肉体上的健康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岂不荒唐？

《安妮·霍尔》（1977）和《解构爱情狂》（1997）这两部电影更是不乏“并置不协调”的幽默技巧。在《安妮·霍尔》中，艾维与安妮初识时透露自己在接受心理治疗。安妮很惊讶地问：“你在看心理医生？”，艾维自嘲道：“是啊，才看了十五年而已（just for fifteen years）”。通过将程度副词“才”与漫长的十五年疗程并置，他刻意制造文义上的矛盾感，从而戏谑地批判了心理治疗的徒劳——十五年竟毫无进展！随即他调侃道：“我打算再给他（指心理医生）一年时间，不然就去卢尔德（Lourdes）朝圣”。这个玩笑巧妙地将现代心理治疗与古老宗教奇迹并置。卢尔德是法国西南部天主教朝圣地，该地泉水据说具有神奇的治愈力，已治愈了 70 余起奇迹病例，每年吸引数百万人朝圣。艾维的这句玩笑让人想起弗洛伊德（1933, p. 208）曾经的坦承：“我不认为我们的疗效能与卢尔德相提并论。信仰圣母奇迹的人远比相信潜意识存在的人多得多”。在弗洛伊德看来，当时宗教所能达到的抚慰人心的效果远超早期心理治疗。而在艾维的调侃中，当自诩科学的心理治疗无法缓解现代人的存在性焦虑时，人们竟不得不重新求助于被科学理性所否定的宗教慰藉，至此，曾经被神化的心理医生形象彻底被祛魅。在《解构爱情狂》中，主角哈利在作心理治疗时抱怨道：“当年我有心理医生，现在我有心理医生。六个医生过去了，三任妻子离开了，我的感情生活还是一团糟（I had a shrink then, I had a shrink now. I am six shrinks later. I'm three wives down the line. I still

can't get my love life in order)”。这句独白将“六个心理医生”与“三任妻子”并置,再结合首语重复法,即通过“I had a”和“I am”的重复所形成的韵律结构,令哈利多年心理治疗经历和反复失败的感情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多的心理医生也无法帮助哈利维持一段稳定的婚姻关系,这无疑讽刺了“心理治疗必能解决个人问题”的迷思。

伍迪·艾伦所设计的不协调元素间的喜剧性冲突不仅体现于角色台词,也体现于具体场景之中。在《安妮·霍尔》中,有一处经典镜头运用分屏画面同步呈现出艾维与安妮的心理治疗场景。尽管学界普遍将这一并置镜头解读为“两人关系濒临破裂”(Floriano, 2008, p. 24),却忽略了画面右侧细节所蕴含的深刻嘲讽:作为患者的艾维躺在沙发上,其身影虽占据前景却半匿于阴影,神情难辨;反倒是位于他身后的心理医生,既占据了画面中心,又沐浴在充足的顶光下,每个微表情都纤毫毕现。此处构图暗示了心理医生才是该场景的焦点:只见满头银发的心理医生看似专心聆听患者的心声,实则在机械地扮演着“聆听者”的专业角色。面对患者喋喋不休的抱怨,他全程神情淡漠,虽竭力维持关注的姿态,期间却两次转头,继而低头摩挲自己的手指,仅在患者提高音量时才回神过来,重新将视线投回患者身上。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 1980, p. 23)认为,幽默源于“镶嵌在活的东西上面的机械的东西”,故而“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Bergson, 1980, p. 31)。在上述场景中,心理医生本应致力于倾听病人的烦忧,其重复的动作细节却揭露了他心不在焉的真相。观众本期待心理医生为患者提供专业帮助,却因镜头构图的有意引导,注意到了诊疗过程中医生的开小差行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而在观众的笑声中,伍迪·艾伦成功地完成了对权威的心理医生形象的解构。

二、笑话与专业术语的解构

笑话(Joke)是一种相对简短的叙事,旨在引人发笑,其核心在于最后的包袱(punch line)(Berger, 2017, p. 22)。作为一种特殊的幽默形式,笑话通过双重不协调性产生幽默效果。在形式层面,笑话通过抖包袱来颠覆既有认知(Douglas, 1991, p. 96);在内容层面,笑话所营造的世界往往“诉诸反常、荒诞与无稽之谈”(Oring, 1992, p. 81)。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剧中人物常借助笑话来嘲讽心理治疗之荒谬,从而侧写出冷漠、固执且满口术语的心理医生形象。

在《安妮·霍尔》中,作为喜剧演员的艾维在演出时通过一个笑话对心理医生的麻木和冷漠进行了嘲讽:“我当时想自杀。说真的,我差点就动手了。但我的心理医生是个严格的弗洛伊德学派,要知道——如果你真想自杀,他们照样会收你缺席疗程的费用”。在这个笑话的铺垫部分,艾维先交代的自己的自杀倾向和心理医生的学术背景,引导观众期待这位弗洛伊德学派的专家会如何运用专业理论解读并干预他的自杀冲动。随即设置了荒诞的反转:心理医生在洞悉病患的自杀冲动后,非但没有采取任何专业的干预措施,反而将自身的经济利益置于病人的生命利益之上,要求后者预付缺席疗程的费用。这个违背常理的“点睛之笔”一方面彻底超出了观众预期,从而引发哄堂大笑,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心理治疗早已被商业异化,而心理医生也早已丧失了对真实痛苦的共情能力。

在电影的后半段，艾维还以笑话式的反转（reversal）技巧表达了对心理医生的质疑。当安妮完成首次心理治疗后，她回家向艾维分享经历，提到心理医生将她与异性之间的互动表现归结为“阴茎嫉妒”（penis envy），并询问艾维是否听过这个术语。相较于女友安妮对医生的深信不疑，早有丰富的心理治疗经验的艾维一边点头，一边诙谐地宣称自己不仅熟悉这类弗洛伊德术语，更是“少数患有此症的男性之一”。“阴茎嫉妒”原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有关女性性心理的经典论断，即认为女性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因意识到自己缺乏男性生殖器而产生缺失感、嫉妒或自卑心理。艾维通过自称患有这种本应专属女性的心理症结，颠覆了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仅属于女性的论断。借助这种性别立场的反转，艾维辛辣地质疑了精神分析的科学性，更讽刺了固守于“专业术语的四角高墙之内”（柏格森，1980，p. 23）的心理医生们惯用晦涩概念来复杂化日常问题的作法——此举虽意在挖掘病人的潜意识，却止于解释层面，无法为病人提供更为有效的解决办法。他们“似乎只擅长解释问题，或给问题冠以花哨的弗洛伊德式名称，而非真正解决问题”（Dworkin，2012，p. 72）。

在《奇招尽出》（2003）中，大卫·多贝尔则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杰瑞·福克讲述自己一次失败的心理治疗经历。在那次问诊中，在多贝尔向心理医生坦言自己的紧张和痛苦源于失恋后，后者企图挖掘出患者的潜意识原因，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向多贝尔追问“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你为何如此痛苦？”“这背后还有什么？”多贝尔只能无奈地反复强调“我喜欢那女孩，但她离开了我”。在这则笑话中，多贝尔简单的情感问题与心理医生复杂化的治疗流程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冲突，表现了医患之间沟通的无效性。随着对话的推进，这一场景的喜剧性张力也不断累积，心理医生仍然执念地用专业术语来绕圈子，而患者则愈发焦躁。最后，多贝尔爆发了，他举起灭火器抢向了医生的后脖颈。这一行径以其暴力、夸张又荒诞的形式中止了这场心理治疗，也将这则笑话的喜剧效果推向了高潮：原本象征着理性和秩序的心理治疗场景，被降格成一场无序的滑稽闹剧；而原本权威的心理医生形象，既沦为了治疗流程的推行机器，又因患者的暴力“脱冕”而被拉下了科学的神坛。

三、反讽与治疗迷思的破灭

在古希腊喜剧中，有一种被称为“愚者”（eiron）的角色，他们惯于掩饰真意，假装比实际愚钝，却总能战胜“夸者”（alazon），即那些自欺欺人、愚蠢浮夸的吹牛者。在现代批评理论对“反讽”（irony）一词的多数用法中，仍保留着这种“掩饰”或“隐藏真相”的根本含义，不过其目的并非欺骗，而是为了达成特殊的修辞或艺术效果（Abrams & Harpham，2009，p. 184）。伍迪·艾伦在中电影主要采用了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戏剧反讽（Dramatic irony）等反讽策略来建构幽默话语和幽默场景，通过刻意建构的错位——人们对心理治疗的理想期待和现实困境之间的显著落差——来产生反讽效果，有效地削弱了心理医生的权威地位。

在《安妮·霍尔》中，伍迪·艾伦利用角色艾维的言语反讽对心理医生的权威性进行了戏谑性的解构。言语反讽“是指说话者隐含的意义与表面表达的意义截然不同的陈述”（Abrams & Harpham，2009，p. 184）。在电影中，艾维和安妮感情生变，安妮选择搬离纽约而前往加州之际，搬出心理医生来合理化自己的决定：“是啊，我的心理医生觉得这次搬离对我有帮助”。与往常的

反驳不同，艾维回答道：“你知道的，我很信任她（指安妮的心理医生），因为我的心理医生推荐了她”。粗心的观众可能会认为两人终于达成了理性共识，却未能察觉艾维的反讽之意。艾维以“信任我的心理医生才信任她的医生”为由戏谑回应，而实际上，他对自己心理治疗毫无进展的调侃以及对心理医生这一职业的日常挖苦（由上两节文本分析所列例子可知）早已使这个前提沦为悖论。更具深意的是，当艾维口头附和和心理医生的建议时，镜头却聚焦于他偷偷将《拒绝死亡》这本书塞进安妮箱子的动作。这本存在主义著作不仅呼应了艾维对死亡焦虑的执念，更通过标题的“拒绝”二字，构成对其表面顺从的无声颠覆。这种语言与行为的割裂，在后续情节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艾维飞赴加州试图挽回安妮的行动，彻底表明他从未真正接受心理医生的建议，他从头至尾都认为安妮搬去加州是个糟糕的主意。

伍迪·艾伦还在《安妮·霍尔》中巧妙地运用情境反讽来消解心理医生的权威性。与言语反讽相比，情景反讽“虽然也对表象后面的事实予以揭示，但似乎没有传达具体语意”（庞好农，2025，p.131），这就要求观众主动解读被揭露事实的深层意义。在电影中，自从接触心理治疗后，安妮便将心理医生的建议奉为主臬，时常把“我的心理医生说”挂在嘴边，以期借助其理性光环能够在两性关系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然而这种对专业权威的盲目崇拜，却在艾伦精心设计的情境反讽中不断被瓦解。有天深夜，安妮受街上鸣笛刺激而情绪躁动，提出搬离纽约的想法，并试图为此赋予理性依据：“我的心理医生说我应该住在乡村而不是待在纽约。”艾维立马反驳，声称乡村环境更让他感到焦躁不安，还列举了一系列琐碎而怪诞的意象：安静得疹人的周遭，蟋蟀的鸣叫，还有粘满死蛾子的纱窗。他甚至还将一个加州的犯罪团伙“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¹与安妮理想中的田园想象荒谬地嫁接在一起，以夸张的口吻妖魔化乡村生活，从而解构了心理医生的专业建议，也颠覆了安妮的预期。这场对话所形成的情境反讽效应击碎了安妮“搬离纽约”的计划，她试图借助权威来强化自身立场的行为，反而导致自身话语权的进一步丧失，这更加深了此场景的反讽意味。

此外，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中运用戏剧性反讽的策略来揭示心理治疗对解决个人情感问题的徒劳，继而祛除了心理医生形象的科学光环。戏剧性反讽指的是一种常见于戏剧或叙事作品中的情境，即观众或读者与作者共同知晓当前或未来的事态发展，而剧中人物却毫不知情（Abrams&Harpham，2009，p. 186）。电影一开场，艾维便打破了“第四面墙”，直面镜头絮絮叨叨，坦言自己已经与安妮分手，于是整部电影实则是对这段恋情的回顾与审视。故而，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当这段感情初现裂痕时，两人试图用心理治疗来修补感情中的磕绊，而观众早已从电影开头便知晓这段恋情注定失败的结局。这种已知结局与角色徒劳努力之间的落差，形成了典型的戏剧性反讽，也凸显了心理治疗的无效性。电影中经典的分屏治疗镜头更加剧了这一戏剧性反讽的张力。艾伦通过并置呈现艾维和安妮进行心理治疗的场景，让观众能够同时获悉两人对同一个问题截然相反的描述，明了两人感情之间存在着不可修复的裂痕，更印证了电影开场所交代的结局。

¹ 曼森家族是一个由罪犯查尔斯·曼森领导的公社、犯罪团伙及邪教组织，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活跃于加利福尼亚州。

四、重复与心理治疗的机械性

根据亨利·柏格森（1980, p. 21）的“不协调”幽默理论，重复之所以幽默在于它暴露了生命体所附着的机械性，因为真正鲜活的生命体从不重复自己。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作品中，心理医生一角总是重复着相似的台词和动作，似被流程化的心理治疗机制所控制，于是显得既机械又滑稽。

在《奇招尽出》中，心理医生总以重复的释梦话术回避患者的真正诉求。每当杰瑞倾诉完自己的烦恼，希望从心理医生处得到一些专业的建议时，后者总是机械地转向释梦的环节，反问杰瑞道：“关于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的梦境），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而后，无论杰瑞对此给予多么激烈的抗议，比如扭动身体、音量提高，坐在他身后的心理医生丝毫不为所动，一直维持着同样的姿势，神情漠然。最后一个镜头里，杰瑞直接从床上坐起，打破“第四面墙”与观众直接对话，揭露了自己心理治疗所存在的困境——他和这位心理医生相处三年来总是重复这个模式：他寻求建议，医生让释梦；他抗议，医生追问梦境联想；他最终崩溃，医生不为所动。此重复的技巧揭示了心理治疗的荒谬性，也成功地引发了观众的笑声，尽管这笑声源于他们对期待落空的自嘲——他们竟以为治疗会有进展！

当面对患者过于激烈的质疑和抗议时，“抱歉，我们的治疗时间已经到了”这句在伍迪·艾伦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台词，则成为心理医生滥用专业权威的象征。比如在《解构爱情狂》中，心理医生将哈利的近日烦恼与他小说中的“演员身形日益模糊”这一细节联系起来，认为此细节反映了哈利“希望外界去适应自己的改变”这一潜意识。当这一论断招致哈利的强烈反对时，即后者争辩说真正困扰自己的其实是写作瓶颈，心理医生则以“时间到了”为由生硬地结束了会话。这段情节讽刺有二。首先心理医生在并未倾听患者实际诉求的基础上，武断地将哈利的小说细节解读为他的潜意识表征，体现了心理医生对自身理论框架的盲目自信，以及对精神分析理论套用的机械性。其次，当心理医生指责患者“希望外界适应自己”时，他又何尝不是在要求患者在“适应”自己给出的诊断结果？当观众还在期待心理医生能够针对哈利的争辩做深入的交流和探讨时，心理医生神色泰然、口吻强硬地运用专业权力对患者进行压制，即对患者合理的质疑默认为需要治疗的反抗，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患者施行的精神上的冷暴力？同样地，在《奇招尽出》中，心理医生认为杰瑞购买步枪属于一种发泄行为，并表示后者应该通过交谈进行疏导而不是用行动来发泄。心理医生进一步表示如果杰瑞要坚持留下步枪的话，他将考虑停止对杰瑞的治疗。随即，心理医生不顾杰瑞激烈的争辩，以“我想我们的时间到了”为由结束了会话。且不论心理医生将杰瑞的行为直接定性为“发泄”是否专断，他粗暴地、单方面地结束会话的行为实质上背离了他为病患提出的建议：他主张杰瑞“用谈话替代行动”来疏导情绪，却亲自用行动（威胁终止治疗以及“时间到了”）压制杰瑞的谈话。这一建议与行为之间的落差释放了观众因期待落空而产生的情绪能量，也暴露了心理医生理论的脆弱性。也正因其理论的脆弱，他最终拒绝深入探讨杰瑞的合理反驳，依靠诊疗的中断来维持其权威。

此外，伍迪·艾伦运用重复的幽默技巧来呈现心理医生连自身情感生活都无力掌控的悖论，以此消解掉心理医生形象的专业性。《解构爱情狂》通过叙述一位心理医生在看诊过程中接连崩溃的场景，将这一悖论表达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该电影中，哈利的第二任妻子琼是一位心理医生，当她

发现丈夫竟与自己的女患者有染时，备受打击，暴跳如雷。就在琼与哈利激烈争吵乃至发生肢体冲突之际，她的患者法伯先生按约前来就诊。琼下意识地暂停了与丈夫的争执，尽管泪痕未干，仍强作镇定地在患者面前维持专业形象。然而当治疗开始后，法伯刚开始倾诉烦恼，琼突然道歉离场，镜头随即定格在惶恐的患者脸上，画外则传来她持续十多秒对丈夫的痛斥声。接着琼重返诊疗室，让法伯继续聊他的烦心事，期间甚至还吃了颗镇定药剂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法伯开口没多久，面颊涨红的琼再次失控离场，勒令哈利立刻滚蛋。当琼第三次尝试回归专业角色时，可怜的患者刚颤声唤出“医生”，就被琼朝着丈夫歇斯底里的喊骂声“今晚就滚！人渣！”彻底淹没。通过呈现琼三次尝试维持专业形象却接连失败的经历，伍迪·艾伦塑造的心理医生的不堪形象便跃然纸上：纵使拥有专业的精神分析学识，他们也难免深陷情感泥潭而无法自拔。经历琼接二连三的情绪崩溃后，紧张的医患关系似弹簧般张力越来越强，最终伴随一声巨响方得缓解（柏格森，1980，p.46）。在琼的咆哮声中，法伯最终像孩童般哭号起来——这泪水与其说是出于惊吓，不如说是源于绝望：在他眼中，救赎者自身尚且溺水，又如何能拯救他于深渊？

结语

总而言之，伍迪·艾伦在其喜剧宇宙中精心地对心理医生这一角色类型进行了祛魅与解构。通过并置不协调、笑话、反讽和重复等幽默策略，这些本应象征理性、秩序与治愈的权威形象被塑造成了一群自私、冷漠且无能的家伙。作为虔诚的弗洛伊德信徒，他们不懈地用晦涩复杂的术语解读患者行为表征以求挖掘患者的潜意识动机，全程却保持着情感疏离、利益至上，无视眼前患者真实的痛苦，更缺乏真正的共情。更讽刺的是，这些专业的心理医生自身也深陷情感危机而无力应对。在伍迪·艾伦的镜头下，心理医生的滑稽形象令人捧腹却又引人深思，因为他们精准地折射出现代人的存在性焦虑。在宗教式微的时代，弗洛伊德取代了上帝登上神坛，人们却发现这位新神同样充满了人性弱点。伍迪·艾伦电影中的患者们一边嘲讽心理治疗的徒劳，一边定期向自己的心理医生报到，这种悖论式的依赖关系，恰如当代社会对心理治疗的集体迷信。人们明知心理治疗可能只是昂贵的倾诉游戏，却仍前赴后继地购买这份虚幻的希望。这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或许才是伍迪·艾伦通过塑造心理医生这一人物形象所得出的最尖锐的批判。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论保罗·奥斯特小说中对‘公民不服从’的幽默叙事”（项目编号：25GWCXXM-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u Mengsha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1544-5471>

Zhao Yim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6973-1516>

References

- Abrams, M. H., & Harpham, G. G. (2009).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Cengage Learning.
- Berger, A. A. (2017). *Blind men and elephants: Perspectives on Humor*. Routledge.
- 柏格森 (1980): 《笑: 论滑稽的意义》, 徐继曾译。中国戏剧出版社。
- [Bergson, H. (1980). *Laughter: An Essay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mic*, translated by Xu Jiceng. China Theatre Press.]
- 陈奇佳 (2012): “在悲凉处寻找幻觉的幸福——伍迪·艾伦与‘问题喜剧’”,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02): 131-140。
- [Chen, Q. J. (2012). “The Happiness of Looking for Illusions in a Melancholy World: Woody Allen and His ‘Problem Comedies’”.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02): 131-140. DOI: <https://doi.org/10.13917/j.cnki.drama.2012.02.014>.]
- Douglas, M. (1991). *Implicit meanings: Essays in anthropology*. Routledge.
- Dworkin, R. W. (2012). “Psychotherap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e New Atlantis* (35): 69-83.
- Floriano, M. Á. H. (2008). “The Cinema as Therapy: Psychoanalysis in the Work of Woody Alle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Movies* 4: 17-26.
- Freud, S. (1933).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London: Hogarth Press. Gabbard, K., & Gabbard, G. O. (1987). *Psychiatry and the Cinem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enga, G., & Pediconi, M. G. (2011, August 4-6). “A case for psychoanalysis: The unconscious and sexuality in Woody Allen’s films” [Paper presentation]. 47th IPA Congress on Core Concepts: Sexuality, Dreams and the Unconscious, Mexico City, Mexico.
- Marquis, Don. (2011). *The Best of Archy and Mehitabel: Introduction by E. B. White*. Everyman’s Library.
- Morreall, J. (1987). *The Philosophy of Laughter and Humo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Oring, E. (1992).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庞好农 (2025): “悬念性·反讽性·阴冷性——评《千万别让我走》的幽默叙事特色”, 《外语与外语教学》(01): 127-135+149-150。
- [Pang, H. N (2025). “Suspense, Irony, and Chilling Undertone: A Review of Humorou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Never Let Me Go*”.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01): 127-135+149-150. DOI: <https://doi.org/10.13458/j.cnki.flatt.005082>.]
- 孙慰川、覃嫦 (2008): “论伍迪·艾伦电影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形象”, 《当代电影》(01): 116-121。
- [Sun, W. C., Qin, C. (2008). “On the Image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in Woody Allen’s Films”. *Contemporary Cinema* (01): 116-121.]